

壹、前言

澳洲（Australia）自1980年代以來歷經一連串的經濟變遷，形成以市場化與經濟自由主義為政策導向的思維，這個時期也正是「新右派」興起之際。澳洲政府大都援引經濟法則的思維（Welch, 1996: 17），特別是將自由市場經濟、權力下放、使用者付費（user-pays）、鬆綁（deregulation）等觀念運用到教育政策上（Ball, 1998）。究其本質，實均以市場經濟語言——「自由選擇」為改革核心，在這種以結構調整、效率、競爭、降低規模等口號背後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市場」實際上成了「規訓機制」。誠如Marginson（1993: 70）所指出的，這種市場自由所建構出的社會是訴求C. Darwin或是T. Hobbes式的競爭法則，競爭成為進化的推動力。所謂的社會善（social good）漸漸地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個人權利、效率、選擇等經濟名詞，伴隨而來的種種政策措施也大大地改變了澳洲社會結構，此即Pusey（1991）所批判之「經濟理性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以經濟學的邏輯思維與語言支配社會政策。這也導致澳洲社會中存在於貧富之間、都市鄉村居民之間、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以及新舊移民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大。

澳洲工黨政府於1983年執政，其政令公文中開始出現「社會正義」。在1987年之後，更是成為廣為使用的「政治與教育口號」。例如，維多利亞州的首相J. Cain宣稱他於1987年頒布的《人民與機會》（*People and Opportunities Statement*）公文書是澳洲邁向「更為公平與更為正義社會」（a fairer and more just society）的第一份政府報告。其中，所謂的「健全的綜合教育」成為該政策的核心。1988年工黨政府頒布《邁向更為公平的澳洲：工黨的社會正義》（*Towards a Fairer Australia: Social Justice under Labor*）。該政策陳述辨明一個正義社會的四個核心要素，其中一個核心要素即為「接受住房、健康與教育等主要服務之公平與平等」。

1990年代中期，當大多數的州政府政權由工黨轉移到自由黨（保守

黨)時,工黨政府仍保有其自1983年以來所取得的聯邦政權(直至1996年3月,工黨輸掉聯邦大選,換成自由黨成爲執政黨)。弔詭的是,經濟理性主義作爲其他國家保守黨政府常使用的利器,澳洲工黨政府同樣地引用此管理模式。經濟理性主義者認爲經濟理性係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它是不可忽略的科學真理。若就此角度而言,則不難理解1990年代澳洲工黨的政治施爲與其他國家的保守黨政府並無多大差異,政黨的更迭並不會造成政策上的多大差異,同樣都遵循著經濟學法則,導向其所謂的「更科學、更全面」的改革(吳始娟、Welch、李奉儒,2014)。瀰漫於澳洲社會的自由市場思維,如Yeatman(1993: 3)所言,已使得原本福利國家導向被競爭國家導向所取代。亦即以往國家介入的層面大都在思考如何擴大政府福利事務,現在國家的角色轉而爲思索著如何從公共投資事務上獲取最大利益。這正顯示出市場自由論者的主張,將理想社會視爲Darwin-Hobbes式的市場秩序,在此環境下,競爭被視爲進化的動力,對高等教育政策與實施的影響深遠。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30年間,「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成爲澳洲教育發展與改革的重要領導方針。澳洲各級教育大量擴張,且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自1960年代起也開始擴張。當然,這個時期仍有某些個人或團體未能受益於教育,進而獲得向上社會流動或得到良好的個人發展,特別是原住民學生、鄉村與偏遠地區的學生及低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等。自1980年代晚期以來,在全球化競爭的推動下,自由市場經濟思維的極度發展也爲澳洲帶來一連串以自由開放爲主的高等教育改革。然而,自由競爭的教育是否必然提升高品質的教育?自由競爭的過程是否反而忽略了教育的公平正義?以「市場(或機構)鬆綁=提高教育成就=提升國際競爭力」,此線性經濟思維公式爲主的改革,究竟是爲澳洲近年來的教育注入了活力或是帶來另一種危機?澳洲高等教育政策中屢屢強調的正義與「公平」,在轉向市場經濟理性主義之後,其觀念與實務上是否有所轉變?在市場化驅動下的高等教育政策之社會正義又是何種面貌?未來的展望又可能是如何?這些問題頗值得深入探究。